

《江西宗派图》的创作争议及其对江西诗派的构建

张立荣

摘要: 在中国诗歌史上,“江西诗派”是一个独特的诗歌流派,几乎是自先秦至宋代以来唯一明确用“诗派”命名的诗学群体,体现出宋人在诗学界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吕本中是逆向建构江西诗派的关键人物。吕本中创作《江西宗派图》与其家族和江西诗学之间的渊源密切相关。他随侍其祖吕希哲左右,有机会结交江西诗人,此为《江西宗派图》提供了创作契机和人事基础。《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学界主要有四种说法,应以“写于北宋的大观、政和年间,流传于南宋初年”之说最合理。书名最初应为《江西宗派图》,后来因《江西诗派》诗集的刊刻以及南宋诗社活动的兴盛,逐渐演变为《江西诗社宗派图》。关于江西诗派的人员构成以及排序,宋代诗话、笔记等文献中的记载并不统一,体现出宋代学者基于文献及诗坛状况有意识地进行诗学建构的努力。

关键词: 吕本中;《江西宗派图》;江西诗派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5)04-0143-10

一、江西诗派的“体”“派”独特性

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经常以“体”“派”划分作家群体,尤其是宋代诗文研究,几乎无体派不成论,如梁昆的《宋诗派别论》、吕肖奂的《宋诗体派论》等。“体”与“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体”是就风格、体式等诗学问题而言;“派”是就诗风类似的诗人群体而言。“体”的组合相对松散,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后世学者对于前代诗风类似诗人的一种归纳。诗人们在当时未必有自觉的“创体”意识,被归入同一“体”的诗人在当时也未必有相同的创作理念,只是时代风尚与诗人的个人爱好造就了类似的诗风。就宋诗而言,早期的“白体”“西昆体”“晚唐体”皆呈现出这样一种松散的特征,诗人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笔者在以“体”“派”划分的研究模式论述北宋七律时,发现很多未被划入相应诗体或诗派的诗人无法归类,不同诗体或诗派之中亦多有抵牾。比

如被归为“晚唐体”诗人的魏野和林逋,其诗风与“晚唐体”代表性诗人“九僧”相差较大,魏野的七律甚至表现出明显的“白体”特征。

严羽对诗体理论的建构具有突出贡献,《沧浪诗话》中有《诗体》专章。其中谈论的“诗体”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包括“以时论”“以个人论”“以体制风格论”“以体裁论”“杂体”五部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体”的概念。严羽在“以时论”中以时间为区分标准,非常清晰地划分出16种代表诗风的流变脉络:“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黄初体(魏年号。与建安相接。其体一也),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太康体(晋年号。左思、潘岳、三张、二陆诸公之诗),元嘉体(宋年号。颜、鲍、谢诸公之诗),永明体(齐年号。齐诸公之诗),齐梁体(通两朝而言之),南北朝体(通魏周而言之。与齐梁体一也),唐初体(唐初犹袭陈隋之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

收稿日期:2024-11-04

基金项目: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宋代诗体学研究”(24BZW046)。

作者简介:张立荣,女,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 037009)。

体(元、白诸公),晚唐体,本朝体(通前后而言之),元祐体(苏、黄、陈诸公),江西宗派体(山谷为之宗)。”^[1]

严羽在论宋代之前的诗体时,时间特征非常明显,或以年号代替,或以时段代替。但他在论宋诗的发展时,区分的标准却有些模糊。其中的“本朝体”和“元祐体”均和时间有关,“元祐体”的时间界限最分明,人物也解释得很清楚,但“江西宗派体”和时间没什么关系。单从概念上讲,“江西宗派体”应是一个诗人群体概念,而不是时间概念。严羽将“江西宗派体”放在“元祐体”之后,显然是将其当作一个时间流变而言,他认为在元祐之后能够代表宋代诗风的就是江西诗派的诗人与诗作。

“派”的概念往往是就诗人群体而言,能结成诗派至少需要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一个或几个宗主式的人物成为一派的核心人物,并提出一致的诗论主张;二是有一定的人员信奉其主张并践行于实际创作;三是有一定的创作实绩。当然,诗派的成员应尽可能相隔不远,可以经常切磋。但这些条件在古代并不容易具备,因此中国古代诗论中很少用“诗派”的概念。江西诗派几乎是自先秦至宋以来唯一明确用诗派命名的诗学群体,到严羽这里还被冠上“体”的特征。正因为当时“诗派”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江西诗派自然也引起诸多争议。

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吕本中所作《江西宗派图》中涉及江西诗派的形成时间、人员构成、排名顺序等关键问题,体现了宋人在诗学界开宗立派的自觉意识。目前学界对《江西宗派图》的名称、写作时间等基本问题皆存在较大争议,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揭示《江西宗派图》对江西诗派形成的重要影响,从而体现宋代学者自觉的诗学建构意识。

二、《江西宗派图》作者吕本中的家学与师承

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因祖籍京东路莱州(今山东莱州),世称“东莱先生”,实际上吕氏家族在吕夷简的祖父吕龟祥任安徽寿州知州时即移家寿州,因此又称其籍贯为寿州。吕本中出身于中原世家大族,世称其家族为东莱吕氏家族。这一家族宰相、名臣、学者辈出,如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等,在宋代政坛、文坛及学界皆熠熠生辉,为宋代文化与文学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如王明清《挥麈录》卷2言:“本朝一家为宰执者,吕氏最盛,既列于前矣。父子兄弟者:韩忠宪亿、子康公绛、黄门维、庄敏缜;范文正仲淹,子忠宣纯仁、左辖纯礼……数十年未尝见也。”^[2]

吕本中的先祖吕蒙正《宋史》本传称:“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3]9146}吕夷简是吕蒙正的侄子,《宋史》本传言:“方夷简在下僚,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为相,深谋远虑,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颇务收恩避怨,以固权利,郭后之废,遂成其君之过举,咎莫大焉。虽然,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3]10220}这里虽然对其人品颇有不满,但对吕氏家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这样的人才辈出,还是感叹其世家之盛前所未有。吕公著为吕夷简的第三子,吕夷简曾言:“他日必为公辅。”他亦不负父望,初与欧阳修为友,欧阳修称其“器识深远,沉静寡言,富贵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公著性乐闲退,淡于世事。然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4]。在“元祐更化”时,吕公著与司马光统掌天下,司马光去世后则政出于其一人之手。《宋史》吕公著本传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军国事,虽汉之韦、平,唐之苏、李,荣盛孰加焉。夷简多智数,公著则一切持正,以应天下之务,呜呼贤哉。其论人才,如权衡之称物,故一时贤士,收拾略尽。司马光疾甚,谆谆焉以国事为托,当时廷臣,莫公著若也审矣。追考其平生事业,盖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贤而不能荐,殆犹未免于避嫌,而有愧于从祖云。”^{[3]10708}吕公著的性格与父亲不同,正如欧阳修所说,沉静寡言,性乐闲退,不求富贵,不慕名利,注重心性修养,并以此传与门人弟子。其子吕希哲言:“正献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际,极于介洁。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脱然无留意。故历事四朝,无一年不自列求去。”^{[5]789}吕公著对政治的疏淡直接影响了吕门的家风。

在吕公著之前,吕家在北宋政坛上地位显赫,几乎代代出宰相,可称为宰相世家。但到吕公著这里,门风开始发生变化,吕氏的培养对象由政治向学术转变,这一转变或许是对新旧党争下士人命运更迭的一种回避,或许是一个世家大族经过百年沉淀后的一种智慧选择。自吕希哲起,吕氏走上了学术之路,在《宋元学案》中,仅吕氏一门名列三学案者共7世22人。吕公著被列入“范吕诸儒学案”,是吕氏家族第一位入学案之人。这是吕氏家族由政治世家

转向学术世家的第一步。其后吕氏家族在学术上的发展亦如其政治上一样显赫,被称为“本源末茂,世亦未有其盛”^{[6]285}。《宋元学案》中记载仅吕氏一门就开创了三个学案:其一为《荜阳学案》,以吕希哲为首;其二为紫薇学案,以吕本中为首;其三为东莱学案,由吕祖谦开创。《宋元学案·荜阳学案序录》云:“荜阳少年,不名一师。初学于焦千之,庐陵之再传也。已而学于安定,学于泰山,学于康节,亦尝学于王介甫,而归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广且大。……要之,荜阳之可以为后世师者,终得力于儒。”^{[5]902}可见,吕门之学术一开始就是兼容并蓄的。龚鹏程先生指出:“全谢山谓其‘集益之功,至广且大’,非虚语也。集益之功如此辅以数世家学及中原文献,其为北宋学术之归墟,必矣。大抵北宋之学,象数则濂溪邵雍、性理则二程张载、经术则荆公李觏、经济则范文正,荜阳皆篇收蓄之,而归宿于伊川。又篇洛学之最早者,上承下启,此其几焉。遍考北宋诸儒,无一有此性格、有此地位者。”^{[6]285}《宋史·吕公著传》言:“希哲乐易简行,有至行,晚年名益重,远近皆师尊之。”^{[3]10779}近世研究者对吕希哲在吕氏家族从政治世家向学术世家转向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多有讨论。如李昇认为“吕氏家族学术真正的奠基人是吕希哲”^[7],从学术地位及开山立派而言此论信然。姚红认为“吕氏家族从簪缨世家转入学术家族的转折性人物是吕希哲”^[8],这一论断不尽确切。吕氏家族由政治向学术转折的第一人不是吕希哲,而是其父吕公著。吕公著辅佐四朝,德高望重,其学术成就为其政治成就所掩。吕氏家族第一个入学案者是吕公著,而非吕希哲,吕希哲是吕家第一位开山立派之人。吕本中的家学及交游在很大程度上受吕希哲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跟从吕希哲随侍左右,便没有结交江西诗人的机会,也就没有后来《江西宗派图》的创作,文学史上可能也就没有“江西诗派”之名。

吕公著为“元祐更化”的主要执政者之一,在其后的绍圣党争与崇宁党争中,吕氏成员就成了主要的被打击对象,吕希哲亦入“元祐党籍碑”,屡被南贬。得益于学力心性的涵养,他形成了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性格。《宋元学案·荜阳学案》载:“晚居宿州、真、扬间十余年,衣食不给,有至绝粮数日者,处之晏然。静坐一室,家事一切不问。……闲居日读易一爻,遍考古今诸儒之说,默坐沉思,随事解释。夜则与子孙评论古今,商榷得失,久之方罢。”^{[5]907}党争对于元祐诸人来说固然为人生之不幸,但从一

定程度上来说,元祐诸人外贬也为地方文化的繁荣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吕祖谦《东莱公家传》载:“崇宁初,权臣修元祐之怨,治党锢甚急,群谴辈黜,廷中为空。于是荜阳公废居宿州,公(吕好问)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师,两监东岳庙,客于宿州七年。……(吕好问)复调真州春料船场,司扬州仪曹事。扬据南北冲,贤士大夫舟车上下,必过公而拜荜阳公于堂。如杨侍郎时中立、陈右司瓘瑩中,每过扬,与公语,连日夜不厌,所言皆经世大略。”^{[9]211-212}此时投于吕希哲门下而被吕本中列入江西诗派的,有陈师道以及被称为“临川四才子”的汪革、谢逸兄弟、饶节。吕本中与汪革还是莫逆之交。党争中吕希哲及吕好问的外贬成为吕本中广交学友的契机,也为《江西宗派图》的创作奠定了人事基础。

吕本中本人的师承非常复杂,除了家学之外,他还师承刘安世、杨时、游酢、尹焞、陈瓘、唐广仁等人,刘安世是邵雍的门人,杨时、游酢、尹焞是程颐的弟子,陈瓘、唐广仁则是司马光的门人,因此吕本中可以算作邵雍、程颐、司马光的“再传弟子”。吕本中之后,让吕氏家族再一次闪耀于学界的就是吕祖谦。若以儒学成就论,吕祖谦可谓吕门集大成的人物;若以文学成就而论,吕氏家族中则以吕本中成就最高。南渡之后,吕本中被称为“中原文献之传独归吕氏,其余大儒弗及也”^{[5]1234}。吕本中的诗歌数量较多,有1270余首。钱钟书认为“他的诗始终没摆脱黄庭坚和陈师道的影响,却还清醒轻松,不像一般江西派的艰涩”^[10];钱基博认为“其为诗骨力坚卓,亦得法庭坚,妥帖自然过之,而才力高健不如,所以格较浑而语为弩”,以上确为中肯之评。

吕本中之所以作《江西宗派图》,与其家族和江西诗学之间的渊源有关。吕祖谦记载:“先君子尝海某曰:吾家全盛时,与江西诸贤特厚。文靖公(吕夷简)与晏公勣力王室。正献公(吕公著)静默自守,名实加于上下,盖自欧阳公发之。……二刘、三孔、曾子开、黄鲁直诸公,皆公所甄叙也。侍讲(吕希哲)于荆公,乃通家子弟。……晚节居党籍,右丞(吕好问)以管库之禄养亲。虽门可设爵罗,然四方有志之士,多不远千里从公。谢无逸、汪信民、饶德操自临川至。……盖江西人物之盛衰,观人文者将于此乎考。而吾家江西贤士大夫之疏密,亦门户兴替之一验也。”^{[9]118-119}或许是因为吕氏家族历代皆与江西籍诗人有深厚的交往,再加上吕本中交往的诗人中江西诗人较多,所以他萌发了立派意识。

三、《江西宗派图》创作时间的争议

关于《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一直是学界争论的问题,至今未有定论,主要有四种说法。

1.“少时戏作”

这一说法源自范季随《陵阳先生语录》:“家父尝具饭,招公与吕十一郎中昆仲。吕郎中先至,过仆书室,取案间书读,乃《江西宗派图》也。吕云:‘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语,公曰:‘居仁却如此说。’《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1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三点:第一,当时《江西宗派图》应该已印制成书,但流传不太广,否则吕本中不会问“安得此书”。第二,吕本中对这本书的暧昧态度是造就目前此书写作时间不明的最大因素,“少时戏作”之所以被后世广为接受,是因为其出自吕本中本人之口。第三,韩驹对吕本中“少时戏作”的否定。以韩驹与吕本中的熟悉程度以及被列入宗派中人的身份,他应该知道吕本中写作此书的时间,因此当吕本中说出“少时戏作”时,他表示惊讶。对于《江西宗派图》而言,吕本中和韩驹应该都是当事人,但二人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由此造成后世的不断阐释与解读。

曾季狸《艇斋诗话》亦记载:“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12]²⁹⁶可见,吕本中不止一次说过《江西宗派图》为少时所作。范、曾二人都与吕本中非常熟悉,曾季狸又是吕本中的门人,范季随是韩驹的弟子,所记应该不误,至少表明吕本中自己认为这是少时所作,并对此书不太满意。莫砺锋是较早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辨的学者之一^①,他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辨》一文中,基于“少时戏作”这一基础得出《江西诗社宗派图》作于崇宁元年(1102年)或二年(1103年)的论断,认为此时吕本中19岁或20岁,和“少时戏作”比较符合。文中对吴曾的“绍兴三年说”进行辩驳,认为如果作于此年,则大部分派中诗人皆已去世,就成了死后追认入派,但是韩驹、夏倪、徐俯等都曾表示过对入派的不满意,可见追认入派的“绍兴三年说”不能成立。

2.作于南北宋之交的靖康、建炎年间

大约与范季随、曾季狸同时的孙觌在《西山老文集序》中言:“元祐中,豫章黄鲁直独以诗鸣。当时,江右之学诗者皆自黄氏,至靖康、建炎间,鲁直

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一时学士大夫向慕,作为江西宗派,如佛氏传心,推次甲乙,绘而为图,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耀焉。”^[13]³¹⁸此说认为《江西宗派图》作于靖康、建炎年间。靖康是1126—1127年,建炎是1127—1130年,此时元祐学术重新受到朝廷重视,在宋高宗“最爱元祐”的提倡下,曾受崇宁党禁影响的大部分元祐后人纷纷走上仕途。孙觌认为《江西宗派图》是适应这个时期的政治大背景而作。以1127年计算,作此书时吕本中43岁,算不上“少时”。近世学者韦海英赞同此说^[14]。

3.作于绍兴三年(1133年)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记载:“蕲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相善。既没六年,当绍兴癸丑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详。已而居仁自岭外寄居临川,乃绍兴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诗知名者二十五人,谓皆本于山谷,图为江西宗派,均父其一也。然则居仁作宗派图时,均父没已六年矣。予近览赣州所刊百家诗选,其序均父诗,因及宗派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为耻。’殊不知均父没已六年,不及见图,斯言之妄,盖可知矣。”^[15]

这段话言之凿凿地说《江西宗派图》作于绍兴癸丑年,即绍兴三年(1133年),但此时吕本中已50岁,绝对算不上少时。这一说法是所有文献记载中年代最确切的一个,也是和吕本中的“少时戏作”说时间差异最大的一个。这段话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吴曾所见的《百家诗选》里有夏均父诗的序言,并提到夏均父自己以在《江西宗派图》中排名靠后为耻,则夏均父生前应该见过《江西宗派图》。从上段文字推断,夏均父应卒于1127年左右,则宗派图的写作至少应在1127年之前。但吴曾否定了《百家诗选》的意见,却没有说出原因。如据第二种说法,则《江西宗派图》在建炎年间已经流行,建炎元年即1127年,与夏均父去世时间相吻合,这样夏均父看到《江西宗派图》并作出不满的评语也是可能的。如此吴曾的“绍兴三年说”则不能成立。

“绍兴三年说”在后世最为流行。近世龚鹏程赞成此说^[6]²⁶⁵,孙觌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写作年代献疑》也支持此说,并对莫砺锋的崇宁少作之说提出质疑^[16]。孙觌对吕本中自言“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给出一个有意思的解释,认为“切勿示人”中的“人”暗指韩驹,并推测:“吕本中大概是已耳闻韩驹有意见,所以见范季随‘案间’有

《江西诗社宗派图》，而韩驹又即刻来到，故特地叮嘱范季随‘切勿示人’。……又担心韩驹最终会发现此书，朋友当面，倘质问起来不好意思，于是就诡称宗派图是‘少时戏作耳’，以便搪塞。”^[16]孙觌与莫砺锋都采信了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中的记载：“陵阳先生早以诗鸣，苏黄门一见，比之储光羲。与徐东湖（俯）游，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乃曰：‘我自学古人。’岂所谓鲁一变至于道耶？”^[17]韩驹卒于绍兴五年（1135年），如果像吴曾所言《江西宗派图》作于绍兴三年（1133年），则正好在韩驹的晚年。但此条亦不是确证，本身就用了“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的不肯定之语。有可能是《江西宗派图》于建炎、绍兴年间流传之时，韩驹见到后对自己侧身其间表示不满。王琦珍也支持孙觌的判断，认为：“考虑到崇宁元年前后的政治形势及吕氏家族所受到的政治冲击，很难想象吕本中会在这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公然推尊黄庭坚为‘宗主’，进而描绘出一个所谓‘宗派’，且将徐俯、洪刍及吕氏门人如汪革、谢逸、谢薖、饶节列入其中。以此，宗派图作于靖建炎至绍兴三年之间的可能性，就非常之大了。”^[18]

黄宝华的《〈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则用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此说的可信^[19]。首先，文章用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吴曾所读到的《百家诗选》编选比较粗糙，因此其中关于夏倪所说的“以在下列为耻”则不可靠。其次，文章对“少时戏作”进行了辩驳，认为吕本中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书在当时的流传过程中已遭受到不少非议，特别是徐俯与韩驹。周辉《清波杂志》云：“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20]面对这样的议论，吕本中以“少时戏作”搪塞，是为了淡化舆论。《清波杂志》还记载：“吴虎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非。辉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诤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20]这里认为吕本中的“悔少作”之说，是其门人弟子为掩盖时论而编造出来的，不是吕本中本人的原话。最后，文章从当时宋高宗赵构“最爱元祐”的政治风向论述了《江西宗派图》写于此时的合理性。基于以上三点，黄宝华成为吴曾“绍兴三年说”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4. 作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

大观时期为 1107—1110 年，政和时期为

1111—1118 年。以政和元年（1107 年）计算，则《江西宗派图》大约作于吕本中 28 岁左右。首先提出这一说法的是谢思炜^[21]。谢思炜认为，吕本中在党禁时期大观、政和年间与江西籍诗人洪刍、洪炎、徐俯等交往密切，共同唱和，共结诗社，因此《江西宗派图》最有可能作于此时。据他考证，晁冲之是《江西宗派图》中最后一个与吕本中订交的诗人的结识时间应在大观年间。这就意味着吕本中与列入《江西宗派图》的诗人在大观、政和年间完成交往，具备了作《江西宗派图》的人员条件。

姚大勇支持此说，并进而推断：“可能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影响（元祐党禁在靖康之变后才解除，苏轼、黄庭坚等人文集在北宋末期屡遭禁毁），所以吕本中此图在北宋末期作成后，秘而未宣，至南渡后元祐党人获得彻底平反，此图才随之流传于世，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因而带来了对其作年的不同记载。”^[22]这段话解释了孙觌、吴曾等人关于《江西宗派图》写作时间出现误载的原因。伍晓蔓的《〈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23]亦赞成此说。

笔者认为，作于北宋大观、政和年间这一说法看似没有任何文献可予佐证，却最有说服力。吕本中于大观四年（1110 年）至江西，政和二年（1112 年）离开，这一时期正是以徐俯为中心的豫章诗社活动的高峰期，当时参与诗社唱和的人大部分都入了《江西宗派图》。可见这段时间是吕本中全面了解江西诗人诗风并亲自参与唱和时期，也是最有可能创作《江西宗派图》的时期。如果《江西宗派图》作于这一时期，一方面可以解释出于吕本中本人之口的“少时戏作”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其当时所受批评的原因。关于此点，笔者想补充的是吕本中的弟子曾季狸曾在《艇斋诗话》中云：“东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诤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也。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图则真非有诤次，若有诤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12]296}这是弟子在听到老师所说的“悔少作”之后进行的思考，他认为以吕本中的水平，不应该出现人员紊乱、错漏的情况，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在编撰过程中本来就没有次序，随手所写。但他有一个问题未曾想到，那就是《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与流传时间不一致，写作于北宋末年，流传于南宋初年，这种滞后导致流传中的《江西宗派图》不能准确反映南渡后的诗坛状况，也是徐俯和韩驹不满的原因所在。

四、《江西宗派图》书名及人员构成的争议

1. 关于《江西宗派图》名称的争议

较早注意此问题的是龚鹏程,他在《江西诗社宗派研究》一书中指出,范季随、周紫芝、曾季狸、杨万里等皆称为《江西宗派图》,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绀珠》则称《江西诗社宗派图》,吕本中原名应为《江西诗社宗派图》,之所以称为《江西宗派图》只是简称,省字而已^{[6]263}。

谢思炜也提到关于《江西宗派图》的名称,认为“当从范季随、曾季狸、胡仔等人所记,为《江西宗派图》。后代称引往往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诗社’二字首先见于陈岩肖《庚溪诗话》。《宗派图》中人确实经常诗酒酬唱,但并未在一起正式组成过一个统一的‘诗社’”^[24]。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云:“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至古体诗,不拘声律,间有歇后语,亦清新奇峭之极也。然近时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掇,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吕居仁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山谷为祖,宜其规行矩步,必踵其迹。今观东莱诗,多浑厚平夷,时出雄伟,不见斧凿痕,社中如谢无逸之徒亦然,正如鲁国男子善学柳下惠者也。”^{[12]182}

据笔者所见资料,则范季随、曾季狸、周紫芝、胡仔、吴曾、杨万里等皆作《江西宗派图》,陈岩肖《庚溪诗话》、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绀珠》皆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这些文献的写作年代,则范、曾等人与吕本中交往密切,且范季随自己就读过《江西宗派图》,所记应该不差。如果如龚鹏程所言是省字而已,则不应该所有文献都省同样的字。据四库馆臣考证,最早将书名记录为《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庚溪诗话》应作于淳熙年间(1174—1189年),距吕本中去世已30余年,其中所记自然不如吕本中弟子曾季狸的记载更可信。后世文献之所以加上“诗社”二字,或许只是觉得“江西宗派”的概念过于模糊,因而加上“诗社”以表明归属。也只有“诗社”之成立,才可称为“宗派”,无“社”则宗与派就无着落。

从《江西宗派图》到“江西诗派”的称谓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与《江西宗派图》中诗人总集

的编撰密切相关。莫砺锋和黄宝华都曾谈论过这个问题^②。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中记载,“秘阁修撰给事程公”即程叔达统帅江西时,感叹《江西宗派图》中诗人之诗“往往放逸,非阙与”,于是以《江西宗派图》的名单为准,将“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汇而刻之于学官”,目的是“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励骚人国风之盛”^{[12]310}。这应是江西诗派诗人诗集首次大规模的官方收集与刊刻。“江西诗派”的得名应来自这部总集,陆九渊的《与程帅》中感谢程叔达赠书时言“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13]330},这是最早所见以“江西诗派”命名的材料,他在另一篇《与沈宰》的书信中亦称为“《江西诗派》书”。杨万里为这部书写序时言《江西宗派诗序》,但陆九渊称之为“江西诗派”。陆九渊还在《与程帅》文中首次提及“江西诗社”：“自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思致极幽眇,贯穿驰骋,工力精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13]330-331}但很明显,陆九渊所谓的“江西诗社”是学习黄庭坚的江西诗人群体,而并非真正的结社组织,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这有可能是《江西诗社宗派图》称谓的最初来源。其后陈振孙、刘克庄都在诗人总集中沿用了《江西诗派》这个书名,如陈振孙的“《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24]、刘克庄的《江西诗派总序》等。其后“江西诗派”四字也就逐渐由书名演变为诗歌流派的名称。

2. 关于人员构成及人员论次的争议

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议较大。莫砺锋曾列表对比了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彦卫《云麓漫钞》、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王应麟《小学绀珠》四种文献中关于《江西宗派图》中25人次序与人名的记载,四者略有差异,尤其是后三者皆加入了吕本中本人。其中,赵书去掉了较有争议的何颙,换成了吕本中本人,并将洪朋的位置由《苕溪渔隐丛话》中的第八名提到了洪刍之前,排名第四。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与其他三本相比,次序变动稍大,他将韩驹、徐俯往前提,排到了陈师道的后面;将“有姓名而无诗”^{[13]107}的何颙、潘大观排到了后面,王直方因为“诗绝少,无可采”^{[13]107}排在了25人的最后;又加上了吕本中本人,总共26人。这应该是刘克庄根据自己的见解及后世对江西诗人的评价而作出的调整,是刘克庄本人诗学观的体现,而非吕本中原来的论次。

最早详细记载《江西宗派图》人员的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此书成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距离吕本中去世仅3年。书中记载如下:

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鎡、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迈、夏槐、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图序》数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25]327-328}

可见,胡仔本人应见过《江西宗派图》,因此能够详细地列出名单并记载原文。这是目前研究《江西宗派图》最宝贵的资料。从上述记载可知,吕本中在当时诗坛比较有名,并且自己认为是承传“江西”,因此作了《江西宗派图》,并指明将这些人作为一个宗派是因为其“源流皆出豫章”。这里的“江西”应指以黄庭坚为核心的一批以江西籍为主的学黄的诗人,“豫章”则是指黄庭坚。从刘克庄用“江西”一词代指黄庭坚一脉的诗学来看,当时已有将“江西”作为一个诗学范畴的提法。依据前文所考《江西宗派图》在建炎、绍兴年间的流行,则胡仔这里“江西”的说法应始于《江西宗派图》。

胡仔指出当时《宗派图序》应该有数百字,可惜没有流传下来,但他引用了序中的一段原文,这成为研究《江西宗派图》弥足珍贵的资料。在这段序言里,吕本中极力推崇黄庭坚,认为黄庭坚之前的宋诗皆“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25]328},只有到了黄庭坚“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25]328},再加上后学的仿效,因此具有形成宗派的条件。从吕本中的行文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黄庭坚是继唐代元和之后宋诗新变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宗派图中的人,显然也是接续诗学正统的人。“宗派”意味着有宗有派,也即有领头人及追随者,而江西的诗人群似乎符合成立宗派的条件。这种宗派思维应得之于吕本中的家学渊源及师友渊源。当时儒学界蜀学、洛学、关学等各成其门,吕氏之学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归于伊川之学。吕本中将这种儒门学派思维用到了

诗学上,首次在诗学界开宗立派,意味着理学对诗学的进一步浸透。

关于人物的去取与排序的意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列入宗派中人本人的意见。就目前资料所见,有3人表示不满。韩驹对自己居于宗派图中表示不满,认为自己不是学黄庭坚,而是学习古人:“子苍尝言我自学古人,庶乎于山谷近之矣。”^[17]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对自己排名靠后表示不满:“如正平所云:‘吾乃居行间乎?’”^[26]夏倪“以在下列为耻”^[15]。另一类是其他学者对人员去取与排列的评论,大多数认为“选择弗精,议论不公”^{[25]328}。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25]328}胡仔以南宋诗坛的现状衡量作于北宋时期的《江西宗派图》,进而认为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者不过数人,因而得出“选择弗精”的结论。他的“议论不公”,主要是认为吕居仁对于黄庭坚的评价过高,因此予以辩解。他认为黄庭坚“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25]328},但若像吕本中所言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25]328}则非也;又认为“元和至今,骚翁墨客,代不乏人,观其英词杰句,真能发明古人不到处,卓然自立者甚众”^{[25]328},像吕本中所言之“依效旧文,未尽所趣”^{[25]328}则又非也。

周辉《清波杂志》称:“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20]从中可见,当时就有人认为陈师道不应被列入宗派,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陈师道在南宋诗坛的地位应与苏、黄类似,而高于徐俯等人。关于徐俯、韩驹不满的记载多见于当时及其后的诗话、笔记中,徐俯与韩驹在南宋诗坛地位上升,几于诗坛盟主的地位,他们因而不满于排名或入宗派图,也是可以理解的。因此,进一步来说,韩驹的不满未必就是不满入《江西宗派图》,而更是对排名的不满,只不过借另一种形式表达而已。这从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的排名即可看出,刘克庄在调整次序时,将韩驹排名第二,仅次于陈师道,将徐俯排名第三,这个次序可能更符合二人在南宋诗坛的地位。

孙觌《与曾端伯书》言:“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即云‘宗派’,因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

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师川固当不平。”^[27]由此可见孙觌也认为陈师道不应入派,并解释徐俯之所以被排名靠后是因其与吕本中有嫌隙。但此说显然不能服人。陈师道对黄庭坚明确表明“愿立弟子行”,学黄庭坚诗也是明确而坚定的,将其立为派中人未必不可。孙觌与吕本中不睦,如此解释徐俯的排名也只是臆测而已。

曾季狸对宗派图中“四洪”只录三个表示不解:“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不预,何也?”^{[12]296}“龟父”即洪朋。《江西宗派图》中“四洪”确实只收入三个,但未入的不是洪朋而是洪羽。对于曾几与江端本之兄江端礼未入宗派图,刘克庄也表示不解,其《江西诗派小序》云:“子我(江端礼)诗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晓。岂子我自为家,不肯入社,如韩子苍耶?”^{[12]484}“同时如曾文清乃赣人,又与紫薇公以诗往还,而不入派,不知紫薇去取之意云何,惜当日无人以此叩之。”^{[12]486}

还有人在一些评论中为吕本中辩解,如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云:“《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可见亲自阅读过《江西宗派图》的范季随解释了《江西宗派图》中所列之人起初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后来被刻石流传后,才像禅宗传法一样,有了次序。前引曾季狸《艇斋诗话》亦记载:“东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论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也。……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图则真非有论次,若有论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不预,何也?”^{[12]296}作为吕本中的学生,曾季狸也认为《江西宗派图》编次紊乱,还有漏落,这也是以南宋诗坛的眼光考量之后得出的结论。但他把紊乱的原因归结于少时率意而作、没有特别的次序安排,圆满地解决了对老师的怀疑。赵彦卫《云麓漫钞》也认为吕本中当时并没有“以优劣论次,而姑记姓名”^[28],言下之意即《江西宗派图》中人没有按什么标准进行排列,只是随手所记,因此编次紊乱是可以理解的。周辉《清波杂志》中言:“辉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论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20]这里基本上沿用了曾季狸的原话,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认为这些话是吕本中的学生为老师所作的辩解。这也从侧面透露出《江西宗派图》中人的排名在当时争议比较大,且以负面评

论为多。

关于《江西宗派图》中所列之人的收录标准以及是否有先后次序的安排,笔者认为谢思炜的解释最令人信服。他认为:“图中人物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黄庭坚的学生,如陈师道、潘大临、三洪、徐俯、李彭、王直方、高荷;一类是吕本中的交游,如饶节、二谢、汪革、韩驹、晁冲之、江端本。有些人兼有二者身份,如徐俯、洪炎、李彭。其他人虽不属于二者,但与这些人有密切交往,如祖可、二何、夏倪、善权。”^[21]这一分类比较符合吕本中作宗派图的初衷,而与吕本中交游的这类人,基本上是慕吕希哲之名而入门下之人。

谢思炜认为这些人分属两个文人集团:一个是以王直方为中心的京城文人集团,这一集团在严格的党禁之下仍然坚持元祐学术,成为党禁之下的皇权对立派。这一派人物的特点是在当时皆不得志,但慨然有气节。另一个文人集团是以吕希哲为核心的文人团体,绍圣、崇宁年间吕希哲被贬宿州、扬州一带,因其独有的家族地位及本人的性格学养,而成为“在野旧党分子的领袖人物”^[21]。此时陈师道、饶节、二谢等人皆拜于其门下,以往的元祐旧人张耒等在来往贬所的途中也往往前去拜见,因此“在宿州、真州等地实际形成了一个以吕家为中心的在野集团”^[21]。

但是,若以这样的集团划分,一在京城,一在宿州、真州一带,“江西宗派”似乎和“江西”无关了。因此,笔者认为,“江西宗派”的确立,这两个集团只是人事基础,最主要的诗人社团活动应得自于豫章诗社的成立及诗人的唱和活动。正如《坡门酬唱集》的编撰一样,《江西宗派图》应是有意为诗坛立一派。因宗主黄庭坚是江西人,豫章诗社又在江西成立,大部分主要成员也是江西人,因此命以“江西”之名。这一命名法正得自于洛党、蜀党、朔党等以地名命名党派之思维。

关于人物的排名,曾季狸、范季随、吴曾皆认为编次紊乱,没有次序;孙觌认为“既云宗派,固有次第”;《百家诗选》的编者曾糙也认为有次序;谢思炜则提出了新的看法:“《宗派图》主要反映了吕本中交游的情况,认识较早、关系密切的多列在前面,认识较晚和间接知道的则列在后面。而因此,《宗派图》也就受到吕本中个人闻见的限制,只反映了他政和初之前了解的情况,主观色彩很明显。吕本中自言‘少时戏作’、‘率意而作’,大致是可信的。”^[21]笔者认为,谢思炜的论断比较合乎人之常

情,也能解释吕本中的“少时戏作”之说,以及后人评价编次紊乱的原因。

韦海英对谢思炜的说法提出疑问:吕本中认识汪革早于谢逸,为何将其排在谢逸后面?吕本中没有和潘大临兄弟见过面,为何将其排在前面?韦海英认为《江西宗派图》的排列有次序,并引《紫薇诗话》为证:“江西诸人诗,如谢无逸富赡,饶德操萧散,皆不减潘邠老临精苦也。然德操为僧后,诗更高妙,殆不可及。”她据此认为,谢逸和饶节都不如潘大临,而潘大临、谢逸、饶节分别排在第二、第三和第五位,符合吕本中对这三人的评价。潘大临之弟潘大观与谢逸之弟谢迵,因两人之诗都不可与潘大临相提并论,因而潘大观排在第二十一位,谢迵排在第十八位,未与其兄并列。

韦海英的这一分析解决了《江西宗派图》中没有将兄弟二人排在一起的问题,也解决了三洪的次序排列问题。但让人不解的是,吕本中对徐俯颇为推举,认为他“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作诗赞曰“江西人物胜,初未减前贤。公独为举首,人谁敢比肩”,却将其列为第七名,并因此导致徐俯的不满。笔者认为《江西宗派图》的人员排列确实有一定的次序,这一次序反映了这些诗人在吕本中个人心中的地位,这一排名是综合考虑这些诗人当时的诗坛地位、诗作水平的高低及其与吕本中本人的交往关系而得出的,谢思炜与韦海英皆说出了部分原因。

《江西宗派图》中人物的年龄问题也是一个应该值得关注却多被学者们忽略的现象。据谢思炜先生考证,《江西宗派图》中所录人物最年轻的是徐俯,而徐俯比吕本中大10岁,因此他认为《江西宗派图》只收录吕本中师长辈的人物,对于和其年龄相近的交往者则基本不录。但据笔者所考,韩驹生于1080年,比吕本中大4岁,徐俯显然不是所录人物中最年轻的。《江西宗派图》中大多数人在当时已小有名气,否则不可能“至靖康、建炎间,鲁直之甥徐师川、二洪(驹父、玉父),皆以诗人进居从官大臣之列”^{[13]318}。这些人应在北宋党禁之时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诗名,南宋初年“最爱元祐”的学术政治环境只是给他们提供了适当的时机,造成“一时学士大夫向慕”^{[13]318}的局面。在元祐党人备受荣宠的背景下,对于《江西宗派图》而言,“凡挂一名其中,有荣耀焉”^{[13]318},一般诗人如果能挂名其中,则可能被视为元祐党人。但对于诗坛地位与成就本就很高的诗人如韩驹、徐俯而言,作于早期的《江西宗

派图》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主要原因可能就是地位的变化导致心态的变化。

关于《江西宗派图》中人员的地域问题,也曾引起过质疑。如刘克庄将《江西宗派图》中非江西籍诸人的籍贯一一罗列后,指出这些人都不都是江西人却被列入江西诗派,而曾几是江西人,也与吕本中有诗歌交流却未入派,因此感叹“不知紫薇去取之意云何”^{[12]486}。不是江西人而入江西诗派,确实让人有些费解,但如前文所言,如果吕本中作此图时,是以儒学门宗的思路或是佛学传派的思维,则人员的地域问题就不是主要因素。正如杨万里所说:“江西宗派诗者,诗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诗曰江西者何?系之也。系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13]209}杨万里认为之所以把这些诗人统归为江西诗派,是因为其诗作都学黄庭坚,诗风又大致类似,而不是单纯地以地缘划分,这样就完满地解决了人员的地域归属问题。

姚大勇先生则试图从另外角度解释为什么江西宗派中不完全是江西人的问题。他认为《江西宗派图》中的“江西”不是指地名,而是指黄庭坚本人,并以《苕溪渔隐丛话》中的两则资料为证:“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29]但因为这些资料皆出自同一本书,以“江西”代指黄庭坚在当时具有普遍意义还是胡仔一人之偏好尚难定论。

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知,《江西宗派图》在名称、写作时间、人员的去取与排名等方面皆存在较大争议。笔者收集相关资料进行条分缕析后发现,从名称上来说,最初吕本中的命名应为《江西宗派图》,虽然这一宗派的建构建立在诗学基础上,但“宗派”这一思维的构建则应是受到儒学宗派以地域命名的启发,也可能是受到禅学宗派的影响。但无论是儒学还是禅学,皆可看出宋代学术之开宗立派对诗学发展的影响。从写作时间来看,尽管当时文献记载有“少作说”和“南渡后所作之说”,近世学者也在这两者之间进行辩驳和取舍,但笔者认为谢思炜的作于大观、政和年间的说法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这一推断解决了吕本中所言的“少时戏作”及当时学者关于宗派图人员“去取紊乱,议论不公”的评价问题。

关于其中人员去取与排名的争议,则和《江西宗派图》的写作时间密切相关。如果《江西宗派图》作于北宋末而流行于南宋初,则南渡后元祐学术的重新崛起,造成《江西宗派图》的流传,也造成诗坛的大变动。变动后的诗坛情况自然与反映北宋末诗坛情况的《江西宗派图》发生矛盾,因此,南宋时地位得到很大提升的韩驹和徐俯对《江西宗派图》的排序最为不满。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中对宗派图的重新排序反映了南渡后诗坛的真实情况。

注释

①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一书出版于1986年,但作为书底稿的博士论文却完成于1983年;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一文刊登于《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出版于1983年。这几位先生都是较早关注到《江西宗派图》的写作年限并予以考辨的学者。②虽然有些资料言吕本中本人曾收编过江西宗派图中诗人之诗,但莫砺锋认为此说不确。

参考文献

- [1]严羽.沧浪诗话[M]//何文焕.历代诗话;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689.
- [2]王明清.挥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4:18.
-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4]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M]//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1654.
- [5]黄宗羲.宋元学案[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M].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 [7]李昇.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学术与诗文创作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0:43.

- [8]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D].杭州:浙江大学,2009:174.
- [9]吕祖谦.吕祖谦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 [10]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16.
- [11]陶宗仪.说郛;卷43[M].北京:中国书店,1986:9.
- [12]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6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4]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7.
- [15]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80.
- [16]孙鲲鹏.《江西诗社宗派图》写作年代献疑[J].九江师专学报,1991(4):38-41.
- [17]周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94.
- [18]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63.
- [19]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J].文学遗产,1999(6):66-73.
- [20]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354.
- [21]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J].文学遗产,1985(3):43-51.
- [22]姚大勇.《江西宗派图》作年考[J].江海学刊,2001(3):71.
- [23]伍晓蔓.《江西宗派图》写作年代刍议[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133-136.
- [24]吕本中.吕本中全集[M].韩西山,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1830.
- [25]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8[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6]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M]//王夫之,等.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3.
- [27]孙觌.鸿庆居士集;卷12[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125.
- [28]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96:244.
- [29]姚大勇.江西诗派称谓辨[J].江海学刊,2000(5):114.

The Creation Controversy of *Jiangxi School Map* and Its construction on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Zhang Lirong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was unique, almost the only group of poetics explicitly named “poetry school” since the Pre-Qin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reflecting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Song Dynasty people in the field of poetry. Lv Benzong, a famous poet at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ies, was the key figure in the reverse construction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Lv Benzong’s creation of *Jiangxi School Map* was related to the origin between his family and Jiangxi poetics. He followed his ancestor Lv Xizhe around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friends with Jiangxi poets, which provided the creation opportunity and personnel foundation for *Jiangxi School Map*. There were four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bout the writing time of *Jiangxi School Map*, the most reasonable one was that this work was “written in the Daguan and Zhenghe ye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circulated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title of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which gradually evolved into *Jiangxi Poetry Association School Map* due to the publication and engraving of the poems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poetry society activit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s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ranking of the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the records in poems, notes and other documents of Song Dynasty were not uniform, which reflected the conscious efforts of Song Dynasty scholars to construct poetic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oetry world.

Key words: Lv Benzong; *Jiangxi School Map*;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责任编辑:采薇